

20世纪20-30年代的访苏者及其“红都”印象

张建华 高龙彬

[内容提要]20世纪20-50年代，苏联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的政治符号，在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吸引了各国的目光。来自西方和东方国家的文化人士，成为访苏现象的创造者和记录者。在他们的笔下，展现了苏联迥异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也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访苏现象;政治文化;苏联社会

[作者简介]张建华，1962年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5。电邮：zhangjh171@sohu.com。高龙彬，1980年出生，山东潍坊人，历史学硕士，现为哈尔滨日报社《新晚报》编辑部记者。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成为“红色麦加”和红色焦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断言：“试看未来之域中，定是赤旗之天下”，毛泽东也几乎同时宣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从20、30年代到50年代初，各国知识界人士纷纷来到这个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己国度，试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残垣断壁的背景下、或者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甫息的背景下，去寻找“一块让人类再次得救的新大陆”^{[1](P27)}，寻找“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寻找“人类精神的新方向”。^{[2](P368)}在这些世界级文学大师的笔下留下了真实的红都苏联，也留下他们真实的思考。

一、红都的呼唤

“红色首都”“红色麦加”的寻访者来自世界各国各地，这其中包括：

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作家和翻译家。1920年8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出访苏俄，是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1921年兼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在苏俄期间，瞿秋白数次见到列宁。他写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文学理论家，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单行道》等。1926年访问苏联，回国后发表了《莫斯科日记》。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主要代表作有《飞鸟集》、《园丁集》。泰戈尔于1930年9月11—25日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下观感录《俄罗斯书简》。

胡愈之（1896-1986），中国著名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31年，他结束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学业，在返国途中对苏联进行访问，回国后著《莫斯科印象记》，介绍苏联十月

革命后的成就。

曹谷冰（1895—1977），著名记者和《大公报》董事。1931年3—6月，受《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委派出访苏联。张季鸾一直注意苏联的发展，早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时，他就曾以“一韦”笔名发表《列宁逝世》一文，评论说：“列宁逝世之报，将永为人类历史上特书大书之事，何则？由一种意义言之，彼乃千古之一人也。历史上所谓大英雄，其事业往往仅代表一民族或一国家为止，而列宁之理想，则为人类的，其事业则为世界的。”1931年3月12日曹谷冰踏上苏联国土，开始四个月的采访，曹谷冰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他到过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巴库等大城市，也去过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偏远地区。期间，《大公报》连续开办专栏《赤区土地问题》，他还写了20多篇通讯、特写和游记，较为全面和客观地报道了苏联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人民生活、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外交政策。曹谷冰回国后，应《大公报》出版部的要求，把自己关于苏联的报道、特写和游记加以补充，合编成《苏俄视察记》，问世受到读者欢迎。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12年专事写作。一战中写出一系列反战文章，汇成文集《超脱于混战之上》。1935年6月访问苏联，写有《莫斯科日记》。

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战间，在比利时参加救援法国难民的工作。1925年，游赤道非洲，作《刚果游记》，斥责欧洲殖民者的罪行。1936年5月，访问苏联，发表轰动一时的《从苏联归来》并退出法共。

茅盾（1896—1981），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1946年，茅盾翻译并出版了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茅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于1946年12月5日至1947年4月25日赴苏联访问。此间，茅盾写下《游苏日记》，内容翔实，文笔细腻，叙述中兼有抒情，生动地记录了茅盾当年访问苏联时的见闻与观感。访苏结束回国，他又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和传记作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不仅在1936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成为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并于次年出版了《西行漫记》。而且还曾在卫国战争最激烈的年代——1942年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和战地记者身份访问苏联，他著有《战时苏联游记》。全书共九章，分别是“横贯大草原”“解放顿河”“火”“斯大林格勒的史诗”“后方”“莫斯科之冬”“苏联与日本”“苏联内幕”，记录了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的军事、外交、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

沃尔特·格雷布纳（Graebner Walte, 1909-），《时代》和《生活》杂志驻外通讯记者。1942年5月，《生活》杂志派他到苏联收集照片和其他资料。离别是，杂志主编告诉他：“设法弄清俄国人民的实际状况。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我们现在正在同他们合作，我们在战后也将和他们合作。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他们、他们在做什么？朝着什么方向？”^{[3] (P914-915)} 苏联社会给格雷布纳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尤其苏联妇女的美丽和勤劳。他说：“我所以详细地谈到妇女，是因为她们给我一个深刻的最初印象。”他是受战火摧残的列宁格勒围困前离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他从苏联带回了数千英尺影片，这部影片是由160位苏联摄影师在前线拍摄的，其中因此而牺牲了32人。后电影命名为《战时的一日》编入“时代在前进”专辑中在美国播放，社会反响极大。通常极少对电影进行评论的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评价：“《战时的一日》是所出品的纪录片中最诚实、最残酷、最惊人和最恳切的一部影片。”格雷布纳也认为“它大概是这次战争最好的影版。”^{[3] (P915)} 但是，格雷布纳苏联之行影响最大的是他后来撰写的《从俄国旅行归来》（Round Trip to Russia），于1943年3月在美国出版，书中对苏联进行了极其客观的描写和介绍，引起世界性轰动，也为格雷布纳博得了极高声誉。

在短短的20余年间，有如此多的世界级文学大师竞相访问苏联并且以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自

己对这个曾经陌生的国家的看法，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称为“访苏现象”了。而这些来自异国的新奇目光和赞美批评，从一个不可多得的侧面丰富了那一段苏联历史。

1929年首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突然之势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倾巢之下，几无完卵。罗曼·罗兰在法国宣布：“对欧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整个欧洲就是一所疯人院”，他直言“永别了欧洲！……你在坟场中走着，步履维艰。这里就是你的归宿，躺下吧！……让别人领导世界！”^{[4] (298, 312)} 各国都在为克服危机寻找出路：美、英推行“凯恩斯主义”，充分发挥国家的调节作用；而有着军国主义残余的德、意、日，却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各国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从而，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和苏联构筑“集体安全体系”失败的情况下，世界又走到战争的边缘，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战。

瞿秋白则这样评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我们的人们由野蛮的军阀和卑鄙的官僚统治着，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而只是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中国，由于军阀官僚的压迫，不仅无产阶级甚至知识分子也蒙受难以描述的苦难。”^{[5] (P161)}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这个大坐标系中，找到了苏联这个参照物，瞿秋白指出：“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放眼世界，“我们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与黑暗实力进行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而始终没有灰心丧气。”^{[5] (P161-162)} 可见，苏联成功的经验成为渴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共产党追寻的目标。

与中国相同命运的南亚文明古国印度，17世纪以来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追求国家的独立也是印度人民斗争的目标。20、30年代英国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强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个时期“正是英国殖民主义加深对印度的掠夺和印度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运动高涨的时期。”在泰戈尔看来，苏联的实践对印度人民来讲，“无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6] (P1-2)} “苏联各个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工农业蒸蒸日上，文化事业迅速发展”；“革命摧毁的是列强的势力；轰击的是富家的金库；剥夺的是少数人的特权。”泰戈尔呼吁印度人民起来与殖民当局作斗争——“那警察的袭击算不了什么，告诉我们的后代，勇往直前吧！”^{[7] (前言 5-6)}

就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和民族国家深受其压迫的同时，苏联正如同徐徐而升的朝阳引世人注目，与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一边是繁荣稳定、蒸蒸日上，一边是萧条动荡，江河日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的第一年1928年，苏联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欧洲第一的强国苏联通过教育的普及和强化，把劳动人民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提高到世界的第一位。这为泰戈尔所倾倒，他强调：在苏联“理想变成现实”，声称苏联踏上了教育这一“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最广阔的坦途”。教育改变了苏联人民的精神面貌，泰戈尔赞叹：“哑巴开始说话了，愚昧的人变聪明了，软弱无能的人坚强起来，沉坠在耻辱之湖底面的人，今天走出了社会的暗室获得了和其它人所有人同样的地位”。^{[6] (P13, 5, 48)} 安德列·纪德指出：“我在苏联最欣赏的，也许莫过于苏联措施：几乎到处都采取了措施。让最普通的劳动者接受教育，这只取决于他们自己提高素质。”^{[8] (P64)}

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状况，使这些被压迫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他们自身就对压迫、剥削、奴役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厌恶、敌对的情绪，不可能在西方列强那里得到他们追求的目标——独立、自由、民主、富强。而西方世界在危机和战争的威胁下，似乎一时也找不到根本的出路。所以与西方异质的苏联社会和她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就，对东西方都有着借鉴的意义。于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忧患的意识，转向新型的苏维埃政权，把她看成是人类的希望，纷纷来到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之所，进行实地的探询和了解。他们或者以朝觐式的拜谒、或者以记者式的评述、或者以文人式的寻味，奏响了一组访苏的“交响乐”。

来苏联访问的大多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记者等，他们大都受过“红色”的熏陶，

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很早就成为法国共产党党员，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罗曼·罗兰在瑞士时，通过吉尔博主持的《明日》杂志，与流亡瑞士的列宁、季诺维也夫等进行过深切交往，经受了共产主义学说的洗礼，被苏共视为“苏联的老朋友”。安德烈·纪德称自己“从心灵、气质和思想来看，我过去一直是共产主义者。”^{[2](P373)}他与保加利亚共产党有联系，与季米特洛夫等有交往，为拯救被希特勒囚禁的季米特洛夫奔走呼吁。

罗曼·罗兰自十月革命以来就一贯热情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认为十月革命使人类向前迈出的脚步“比从旧政体跳向法国大革命的飞跃还要来得更高更远”。^{[9](P192)}20年代后期，苏联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尽管罗曼·罗兰对斯大林党同伐异的做法不甚赞同，但他依然把苏联的建立看作是与充满剥削的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典型事例，认为苏联是代表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新世界。这种信念即使在他亲眼目睹了苏联存在的种种弊端之后，也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罗曼·罗兰于1935年6-7月接受苏联政府和高尔基的邀请，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参观访问。罗曼·罗兰受到斯大林的两次接见，所接触的也几乎都是苏联高层人士，期间，他一直住在高尔基的家中，他的一切活动均听由高尔基和苏联文化机构的安排，活动以接待社会各界代表团的来访为主，还经常同苏联高层领导人接触，并与他们一起参加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健康原因，罗曼·罗兰很少外出，对苏联社会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

安德烈·纪德深为苏联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所吸引，宣称接受共产主义，并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安德烈·纪德本已于1935年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准备访苏，但此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已拉开序幕。这给他的旅行蒙上了一层阴影，又使他犹豫不决，“那边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害怕，我非常害怕苏联的局势会转向资产阶级化。”^{[2](P394)}直到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促使安德烈·纪德访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行前他收到老朋友、俄国作家维多·绥奇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揭露了苏联目前的恐怖局势。作家受到这封公开信的影响，希望亲自做一次实地考察，以了解真相。

本雅明生于柏林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犹太教的弥赛亚思想塑造了他的救世主义意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施以重创，本雅明由于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而开始转向救世主义的社会主义。1926年12月，35岁的本雅明来到莫斯科，在此逗留了近两个月。他的莫斯科之行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到苏联寻找昔日的情人——拉脱维亚女导演阿斯娅·拉西斯，并试图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正是这位女导演使他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其二，他准备近距离观察一下苏联的现状，并希望与苏联建立某种官方联系，从而解决他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党籍问题。他宣布自己来到苏联的目的在于“近距离观察俄罗斯的情形，以便考虑悬而未决的德国共产党党籍问题”，^{[10](P33-34)}苏联已成为他的参照系。访苏期间，本雅明以城市“相面师”的眼光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等方面的状况做了生动的描述。

瞿秋白访问苏联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但此时的他已经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苏联，他不仅进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而且在张太雷的介绍下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泰戈尔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有着共产主义信仰，不顾“好心人”对他身体的担忧和劝阻，毅然接受苏联的邀请。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是来访者的动力之一。他们来苏联为的是寻找心灵的寄宿地和慰藉地，安德烈·纪德所言“在现实的压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诚和自由的心灵”。^{[11](P1-2)}

同时他们还是那个时代的各自国家进步世界的“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社会的触角，社会良知的体现者，现象的洞悉者。他们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旗帜，代表着国家的民间思想主流，担当着国家的精神支柱。作为左翼势力的主要代表，来访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他们国家和世界的潮流，有着共同的使命感。他们不仅属于自己的祖国，更属于整个世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体现者。本雅明强调：“用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来观察评价欧洲……是身在俄罗斯的神情关注的欧洲人义不容辞的首要责任”；安德烈·纪德称“为

了颂扬这种新生，当然有必要活着，贡献一生，助其成功”。^{[8] (P64)} 罗曼·罗兰指出：“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的一边。她是代表着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即使苏联不代表我们的共同理想，她的公敌却是我们的死敌。”^{[9] (P192)}

安德烈·纪德指出：“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努力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那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有巨大的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向往”，“赞赏并热爱苏联那里的尝试，前所未有。让我们心中充满希望，期待那种尝试获得巨大的进展，并带动全人类的飞跃。”“我们在心中和头脑里毅然决定将文化的前途系于苏联的光辉命运”。^{[12] (P893,891-892)}

同时，这些知识分子拥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声音是代表全世界的共同心声，他们是和平主义的追随者和执行者。早在 1926 年 4 月，罗曼·罗兰就与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合作成立“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1933 年拒收德国总统兴登堡颁发的“歌德奖”，并在“国际红十字会”新成立的“战俘通讯处”工作。1932 年他与安德烈·纪德出席世界反法西斯大会并出任主席，并指出“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安德烈·纪德为西班牙“人民阵线”呐喊。同时，人性、道德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安德烈·纪德宣布苏联之行的目的不是在于发现一个国家，而是在于发现“人，各种人，他们过去的处境与他们现在的状况”。^{[2] (P395)}

值得一提的，苏联政府是把邀请国外友人和名人访苏看成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政治斗争的。

苏联也希望各国的访问者（尤其是西方）宣传他们所见到的苏联现实，以其树立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和地位。因此苏联政府以积极的姿态，邀请各国知识界名流访苏。“访苏现象”在苏联表现出很强的官方性，其中起桥梁作用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于 1925 年成立，1958 年更名为“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它是苏联各社会团体的群众性志愿联合会，宗旨是发展和巩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合作。

苏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安德烈·纪德写道“我们除了卧铺包厢还有一间客厅，到时候就在客厅上菜用餐，好得不能再好”，“那里对我毫无限制的款待，真叫我害怕……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权，实在明目张胆”“乘坐专列，乘坐最高级的汽车，住最高级饭店的最豪华客房，给我享用的东西是最丰富、最昂贵、最精挑细选的”。^{[8] (P5, 107, 108)} 安德烈·纪德的一位熟悉苏联物价的随同者估计每次宴会包括酒水，每个人头要花费 300 多卢布，而当时的一个工人的工资也不过 50、60 卢布。罗曼·罗兰在 1936 年 6 月 26 日从莫斯科写给妹妹玛德莱娜信中指出：“人们这样接待我，是和我的身份不相称的，有时使我觉得有点吃不消。”^{[9] (译者前}
^{记)}他对斯大林的接待和谈话的反应是“我老实告诉你，对我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我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在这里受到过如此好的接待。”^{[9] (P4)}

罗曼·罗兰在高尔基家中所受的待遇就更不必说了，而且，由于健康原因，官方还专门委派专职医生和护士，照顾他的起居。罗曼·罗兰一直沉浸于鲜花和荣誉之中，满足于苏联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纪德则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他本不愿意看到的差异和特权。“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8] (P114)}

苏联政府上述所作所为必然在来访者的脑际中产生了疑问？安德烈·纪德指出其关键之处，“显而易见，他们如此慷慨投资，是另有希图——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事情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赞扬而不能批判”。^{[5] (P109, 5)}

二、访苏者的视野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的访苏者是怀着对苏联的热爱，或者是对新制度的无限憧憬，或者是对新事物的强烈好奇感踏上苏联这块陌生的国土的。因此他们首先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从未见过的全新气象，那就是在苏联充斥着欢乐、热烈的气氛。苏联人民情绪乐观、健康向上，热情

赞颂革命，热烈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坚决支持政府的政策，并积极地投身于工业化建设。

由于访苏者迫切地希望了解红色苏联究竟为何种风貌，因此，苏联的普通群众——人民即成为访苏者苏联之行的主要观察对象。安德烈·纪德在同劳动者民众直接接触，在作场、在工厂；在休养院，在花园或‘文化公园’，都感受到深刻的快乐。他感受到一种友爱正在新同志中间迅速建立起来，他感到“心花怒放了”。而且在那里，他好多次都由于“过分的快乐”而眼睛中充满了眼泪，爱和柔情的眼泪。他体验到：“广大的人群都是端谨、正直、尊严和守礼的，可是没有受一点拘束，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像在苏联，那般轻易，直接，深切和热烈，去同一切的人和任何的人相接触。”^{[8] (P23)}瞿秋白则称赞：“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5] (P161-162)}放眼世界，“我们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实现社会主义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而始终没有灰心丧气。”

本雅明是上述访苏者群体中的先行者，而且1926年是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全盘展开时期。因此，此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他的印象是全新的、生机勃勃的和不可战胜的。比本雅明晚10年访苏的罗曼·罗兰仍然体会到了这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感受到了苏联普遍百姓发自内心的主人公精神和公民意识。他在《莫斯科日记》的附记中写到：“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限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于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证明这一点的是类似6月30日盛大庆祝游行那样的，显示人民强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是我在高尔基那儿接待的民族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所显示的齐心协力，尤其是从全国各个角落寄给我的信件。”^{[9] (P109-110)}对此，就连目光犀利、对苏联颇有微词的安德列·纪德也感叹不已：“然而这点仍是确实的；俄国民众表现快乐。……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在苏联一样，人民本身，街上所遇见的人，所参观工厂的工人，以及拥挤在休息、文化或娱乐场所的那些群众，是如此笑容满面的”，“我不能设想，苏联以外其他地方，人们能够那般深切那般强烈觉到人类的感情。”^{[8] (P119, 23)}这种快乐极大地感染了安德列·纪德，使他也感到无比的快乐。高尔基下葬那天在红场演说时，他情不自禁地宣告：“我们拥护苏联！”^{[8] (P61)}

罗曼·罗兰在写给妹妹玛德莱娜的信中谈到：“人们这样接待我，……是十分动人的。……人们没完没了地向我欢呼，不论在剧院外，还是在剧院内，在剧院入口处，接着在第三场中间休息时的片刻；在剧院外面，在台阶上下，在广场上，一群热情的男女向我欢呼。……群众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在纷乱中我努力与一些人握手，可我得有十万只手才够用。”^{[9] (P4)}

泰戈尔为教育改变了苏联人民的精神面貌而感动，不禁写下如下的诗句：“哑巴开始说话了，愚昧的人变聪明了，软弱无能的人坚强起来，沉坠在耻辱之湖底面的人，今天走出了社会的暗室获得了和其它人所有人同样的地位”。^{[10] (P13)}安德烈·纪德也表示：“我在苏联最欣赏的，也许莫过于苏联措施：几乎到处都采取了措施。让最普通的劳动者接受教育，这只取决于他们自己提高素质。”^{[8] (P64)}

访苏者也善意地看到，苏联公民由于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并且基于强烈的苏联公民的自豪感，在与来访者的言谈话语中也体现了无知和自大。一些苏联人多次向安德烈·纪德提出类似“巴黎是否有地铁”、“法国是否有幼儿园”这样的问题。有了“几年前，我们可能向德国和美国学点什么。而现在，再也没有可以向外国学习的了。因此，讲他们的语言还有必要吗？”的话语。安德烈·纪德感觉苏联人从不关心外国发生的事情，即使偶尔关注一下，“他们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国人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所关心的，乃在知道我们是否充分称赞他们。他们所害怕的，乃是我们不十分知道他们的功绩。他们所期望于我们的，并不在于指责他们，而在于恭维他们。”^{[8] (P15)}本雅明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世界要比世界（除了拉丁美洲国家）对俄罗斯所知要少。……可以说，俄罗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无

知很像十卢布的票子：在俄罗斯很值钱，但在国外不被承认为通货。”^{[11] (P70)} 安德列·纪德认为以致苏联人所看中的就是“了解我们对他们是否充分赞赏，他们唯恐我们对成就了解的不够。而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不是告他们什么情况，而是恭维他们。”^{[8] (P15)}

苏联人的无知和自大固然有其民族性格之弱点的原因，但在当时的特殊年代，这与政府当局的有意引导也不无关系。对此，本雅明已有察觉：“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基本上是通过党来进行的，主要包括政治问题。”^{[11] (P70)} 罗曼·罗兰在日记中也谈到：“不仅他们的个人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罗曼·罗兰感到：“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它民族的生命力。……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9] (P113)}

访苏者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经济基础的薄弱，看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斯大林提倡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政策给苏联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作家们的眼里，大多数苏联人衣衫褴褛、食物单调、住房糟糕、消费品匮乏。这一切令作家们震惊。本雅明和安德列·纪德的日记中都不止一次提到人们一大早在商店门口排长队等候购买当天供应的物品的场景，结果常常是，不到晚上物品已被销售一空。据说，当时苏联市场的供应量仅够满足一半人口的需要。由于物品奇缺，人们只能决定“拿与不拿”的问题，却丝毫不敢有选择质量的奢望。“人们甚至可以相信，为限制需求之故，种种衣料物品故意做得尽可能地粗拙，使得人们万不得已时才去购买。”^{[8] (P123)} 安德烈·纪德心中社会主义乐园的形象似乎一下子破灭了。就连深居简出的罗曼·罗兰也从妻子玛莎的家人所住的简陋又拥挤的房屋中隐约感觉到了苏联的困顿。

罗曼·罗兰在在乘坐高级轿车旅行途中遇到了这样的情景：向他投去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他们显示了一下拳头。”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高层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榛鸡以及诸如此类。”而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玛莎的朋友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 86 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 25 至 30 卢布。

其次是招待客人之待遇与服务于此的苏联人民生活的差异之大。苏呼米附近有一家西诺卜旅馆，安德烈·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之用。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列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 2 米半，宽 2 米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 75 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8] (P123)} 当然人们设法来尽可能地款待一位宾客，到处提供最好的事物给他看，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8] (P118)}

安德烈·纪德把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工资做了比较。工人小职员，女佣的工资一般在 50—250 卢布。技术工人可达到 400 卢布。高级官吏、教授、艺术家、作家工资则一般在 1500 至 10000 卢布。有些人每月收入可达 200—300 万卢布。工资差异如此之大，也不得不让人想到剥削。用安德列·纪德话来说，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狴，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之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人。”他不无挖苦地写道：“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中爬上来，就已经看不

起贫穷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8] (P124-125, 114)

尽管罗曼·罗兰走的是上层路线，但是细心的作家仍然发现“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是受到特别关注的作家。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总是通往别墅，道路沿线还设有警察，他们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在地平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雪白的漂亮的疗养院供政府的上层成员使用。”^{[9](P115)}

但是，将苏联视为自己生命的罗曼·罗兰仍然认为：“没有理由，也不该有理由认为，保卫国家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军队及其领导人正在冒险变成特殊阶级，而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9](P115)}在他看来，官僚阶层利用政治上的权力之便为自己及亲属谋取一些生活上的舒适（如住房、食物和交通工具等），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有谁会普遍困难中的享受机会作为自己的过错？！”^{[9](P116)}他表示，即使在苏联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他也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因为他从不认为革命能够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次革命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苏联的革命可能是人类在通向目标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的最大的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从发展的眼光看，苏联还是值得肯定的。总之，罗曼·罗兰并不把苏联社会中的差异和特权现象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和异化。

本雅明则通过对莫斯科路人行色的描述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这里的人并不太关注时间。……很少看见街上的人行色匆忙，除非天气特别寒冷。他们已习惯踉踉跄跄地走路了。”安德烈·纪德认为日常生活中苏联人在极其亢奋的政治热情之外又表现了极其不相称的“松懈”，即：“自从民众得到自由以后，大部分人都松懈下来了”。^{[13](P4)}这使他得出一个结论，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用来打破人们懒散习惯的“发明”。安德烈·纪德认为：“仔细地认真地完成自己职责的人凭什么是英雄？一个国家，所有工人都在做工，本无所用其斯达哈诺夫运动。”^{[13](P57)}这样只能增进人们的毫无掩饰的虚荣心，互相攀比，以及互相妒嫉，甚至是敌视。尽管不可否认这种运动有时也会起到榜样作用，但是，即使树立榜样，也完全不必达到授予英雄称号，悬挂他们的画像及诸如此类的大肆宣扬的地步和程度。安德烈·纪德举了一个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反例：有一队法国矿工来苏联旅行，在参观某矿山的时候，为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作，并无需怎样的发奋努力，他们所做的已经超过斯达哈诺夫的成绩了。

三、苏联——“生虫的苹果”？

对于苏联这样一个集权化和政治化的社会，访苏者们给予正反两方面的评价。安德烈·纪德发现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他不无担忧地思考着：“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8](P124-125, 114, 131, 134-135)}

一个偶然的事情，给罗曼·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奉命为罗曼·罗兰检查身体，他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整个身子软弱无力，检查完成后，医生心有余悸地对罗曼·罗兰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您的疲劳过度，迫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9](P54)}罗曼·罗兰听后，顿时噤若寒蝉。此话道破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能听从报纸，进一步确切地说是高层领导人的说辞，而完全没有自由发表个人看法，哪怕是经过实践

检验的客观事实的权利。安德列·纪德则感叹到：“游历过一次苏联，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安德列·纪德在列宁格勒准备了一篇演说，打算在一个大学生集会上发表，但经过审查后，人们立刻就暗示他：这篇稿不是在“路线”之内的，而他准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这在后来的确应验了。本雅明也是如此，他为苏联的百科大辞典写的歌德辞条同样因为不在路线之内，而被退回。

安德列·纪德发现，在苏联，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甚至连服装都是统一的白色基调）。“第一眼看上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13](P27)}因此，同每一个俄国人说话，就如同与所有俄国人说话一样。纪德还通过对一个集体农庄住宅的描绘，来体现这种一致性：“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是可以互相交换的。”^{[13](P32)}表面的一致性反映在人的精神领域，则是思想自由的完全消失。“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评价任何理论、观点和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分析它是否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和科学，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官方制定的‘路线’”。^{[13](P34)}“路线”之内的，怎么说都行，“路线”之外的，则毫无例外地被禁止。纪德本人就遇到过麻烦。在列宁格勒，人们请他准备一篇演说，以备在大学生和文学家的一个集会上讲。结果，演说稿因为不合时宜、不在“路线”之内而没有发表。即便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也同样如此。一件作品无论如何优秀，如果不在“路线”之内，那么它在苏联的命运只能是胎死腹中。例如，叶赛宁的诗是属于“路线”之外的，叶赛宁的名字自然不允许被公开说出，所以，纪德和他的同伴只能趁导游不在时偷偷地朗诵这些诗作。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3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访苏者们在动身到苏联以前，已经对苏联个人崇拜有所耳闻，但当他们踏上苏联的土地后，还是为苏联大张旗鼓的“迷信”和“崇拜”的阵势所惊诧。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50寿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颂扬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列宁的唯一助手和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就这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开始了。从30年代开始，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称颂。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发言时都要有大段赞扬斯大林的套话。安德烈·纪德在苏旅行时就曾碰到这样一件事：到了斯大林的故乡，他想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表示感谢，于是他在邮局拟了电报稿，其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翻译告诉他，在“你”字后需要加上“劳动者领袖”或者“人民导师”之类的敬语，否则就不给翻译，不给发电报！最后安德列·纪德也只好屈服。他在苏联的演说也常常遇到此类修改，这迫使他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13](P47)}在个人迷信时代，国家的重大问题及其决定对群众是严密封锁的，群众没有批评的自由。

罗曼·罗兰尤其感到不解的是斯大林本人的态度，“斯大林对我是一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地对他大加颂扬？……他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他发出疑问：“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地对他大加赞扬？”“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6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浮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人数很多的群众在皇帝包厢前唱起颂扬斯大林的赞歌。人们在行进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举起一个弯着胳膊的手站在那儿的他。斯大林似乎感到腼腆、拘束、不好意思见人，但同时又在展示自己。莎士比亚如能描绘汇集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两个凯撒，两个斯大林，他会获得多大的满足！”^{[9](126-127)}

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罗曼·罗兰明确地表示了批评态度，“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社会上挑起一个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14](P5)}个人崇拜的风靡，往往导致个人专制。在苏联，安德烈·纪德指出“不错，专政，显然的；但那是独夫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共同的专政，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这里不应当抱幻想，应当干脆承认：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再进一步，我们将要说：这恰好是人们所不要的。”^{[13](P49)}“唯命是从”、“循规蹈矩”致使“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思想还会比这更不自由、更加低三下四、更加战战兢兢、更加俯首帖耳”。^{[8](P37)}“个人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团结一致”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体制“是他（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而不是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2](P396)}

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访问苏联之时正值“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的前夜。尽管罗曼·罗兰基本上是在走“上层路线”，更多的是与苏联高层领导人，艺术、文化、教育界高级人物接触，但苏联普通百姓表现出的一些政治恐惧还是被敏锐的作家的眼睛捕捉到。他写到：“苏联青年具有非常好的品质，但同时又是生硬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过早了解死亡和绝望的代价。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但晚上照旧去电影院。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过于高声说话，否则，就暴露了自己。年轻人彼此不信任。”^{[9](P141)}

斯大林和苏共发动大清洗运动的主要理由即是战争威胁日益迫近，来自西方国家和敌国的奸细和间谍进入苏联，有的甚至混入苏联高层领导机构，准备颠覆苏维埃政权。正是基于以上理解，罗曼·罗兰把苏联的专政和“大清洗”运动看作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需要，是暂时性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他并不十分担心苏联会变质。罗曼·罗兰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直接影响。在1936年6月28日斯大林会见罗曼·罗兰时，罗曼·罗兰委婉地问起苏联目前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并说是代表法国同志来询问的。而斯大林则轻描淡写地说成在基洛夫被谋杀后匆忙处决上百人是受了“感情的支配”。而且绝对不给凶手在诉讼过程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以免他们把出庭当作讲坛。我们真要感谢罗曼·罗兰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最高统治者、铁腕人物在肆意挥霍自己手中权力后的自得且毫无忏悔之意的形象。在斯大林那里，他把残酷无情说成是国家的要求，称如果不对所谓“敌人”判死刑，苏联同志会对此感到气愤，会认为这是姑息。他为了解释党和国家著名的有声望的活动家为什么被逮捕及处决时，编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即苏联存在一个广泛分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第五纵队。

“生虫的红苹果”，这是安德烈·纪德访问苏联归来后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个词语。生了虫的红苹果表面上看依旧使人垂涎欲滴，红色光芒的背后隐现出的阴影是那么的不和谐。

来访者把自己国家的现实与苏联的现实的对照后，必然要产生这样那样的感受。面对相同的国家、相同的场景、相同的人们，他们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他们眼中的苏联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笔下的苏联，由于他们的个人经历不同、访苏的背景和目的不同、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访苏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不同，是一个从他们各自实际出发的各有偏重的苏联。东西方人眼中的苏联是异样的——西方人看到苏联的，从总体上来说，更多的是其阴暗面，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东方人一般是“取经般”的崇拜，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光明。

如果说在对苏联人民的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的观察中，作家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当然每个人了解、认识苏联的程度不同）的话，但是对于这一时期苏联社会和政治形势的看法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尤其是在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之间。而且在各位访苏者中，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样是法国作家，还曾经是左翼阵线亲密朋友的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是最为此人关注的。两人对苏联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两位文学大师笔下的苏联即不尽相同。罗曼·罗兰赞美多于批评，而安德烈·纪德批评多于赞美。

闻善则喜、嫉恶如仇是安德烈·纪德的风格。“对于我们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更加严厉些”，是安德烈·纪德评价任何事物的原则。但是他也满怀深情，同时不无怨恨地承认：“那里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有最好的事情也有最坏的事情。”与“往往拒绝看到那坏的方面，

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的其他苏联友人形成鲜明对比。“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13](P45,79)}

访苏者中，安德烈·纪德的前后反应最为剧烈，行前——“我的生命，必须保证苏联的成功，我可为之立即献出生命……就像其他许多人过去和将来所做的那样，我将和它打成一片”，观后——“快乐的情绪缓慢消失了，感官课的理想悄然崩塌了，光明消逝了，苏联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这反映的正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品质——及时而客观的讲述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安德烈·纪德“希望直言不讳坦诚相告会有助于苏联和它在我们看来代表的事业。正是由于钦佩苏联和它已经创造的奇迹，也由于我们对它仍怀有期待；更由于它让我们产生希望，我才要提出批评”。纪德坚信：“一方面苏联终将克服我指出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即一个国家的个别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世界性的事业的真理。”^{[12](P892,893)}

安德烈·纪德于1937年公开出版旅行记《从苏联归来》，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出诸多严厉的批评。安德烈·纪德的转向当即招致苏联当局及其拥护者的强烈指责和辱骂，参加这个反安德烈·纪德讨伐团的，就有先他12个月到过苏联的法国同胞、曾经的密友罗曼·罗兰。对此，安德烈·纪德又写下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为自己争辩。

罗曼·罗兰访苏期间一直走的是“上层路线”。在访苏者中身份最高、接待规格也最高，他对亲眼所见也最为矛盾。罗曼·罗兰作为长期的“苏联之友”，他始终对苏联采取乐观态度，尽管他同样看到了坏的事情，消极之处，同样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满。与高层领导人的频繁接触对他影响极大，使他习惯于从政治家的角度审视苏联，从苏联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从苏联当前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去观察、分析展示于眼前的具体问题。因而，尽管对苏联存在的弊端多少有所察觉（当然程度有限），但总的来说，罗兰的态度是赞扬多于批评，即使批评，也只是暗示，并不明说。罗曼·罗兰对于自己亲眼所见苏联社会和政治的负面现象采取了“鸵鸟战术”。为了不让自己心目中的圣地受到非议，更为了访苏日记中“不合时宜的”文字成为他人攻击苏联的武器，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法文原件的扉页上留下这样的文字：“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断。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断。”罗曼·罗兰之所以发表这个声明，不是由于与高尔基的特殊关系，唯恐会嫁祸于他或者是影响他们20多年的友谊。因为高尔基在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完全可以在一年后发表这本日记；也不是由于斯大林的威慑，从斯大林这方面来看，虽然对发不发表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斯大林不会像“大清洗”那样，也把罗曼·罗兰“清洗”掉了。斯大林既不会这样做，也无法这样做。从罗曼·罗兰这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良知的知识分子不会把真话完全系于个人安危之上。他在自传中讲到“每天早晨，邮差给我带来污言秽语和一札札匿名恐吓信作为我的早餐，这些信件威胁我将遭到与饶勒斯（Jean Jaurès）同样的命运”，“在‘广场上的集市’中遭到我无情抨击的文学界那帮乌合之众”，想借舆论将我置于死地。”^{[4](P296)}

访苏后的罗兰依然是苏联最亲密的、最可信赖的朋友。罗曼·罗兰之所以这样所为，主要是为了不给自己心目中的圣地和理想国增加污色，因为他太热爱这个国家和这种制度了。他始终对苏联的前途满怀信心，并未因某些领导人的失误而改变。就像他在《莫斯科日记》一再强调的，“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9](P2)}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M]，康征、齐小曼译，三联书店，2005
2. 皮埃尔·勒巴普：纪德传[M]，苏文平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
3. 商务印书馆编：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Z]，商务印书馆，1978

4. 钱林森编译：罗曼·罗兰自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
5. 瞿秋白：赤都心史[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泰戈尔：俄罗斯书简[M]，董友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 白开元等译：泰戈尔游记选[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8. 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M]，李玉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M]，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0.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 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M]，潘小松译，东方出版社，2001
12. 安德烈·纪德：纪德文集[M]，徐和瑾、马振骋译，译林出版社,2001
13. 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M]，郑超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